

陈 军 著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Song of Dynasty

透镜中的宋代建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透镜中的宋代建筑

陈 军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镜中的宋代建筑/陈军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80-0587-6

I. ①透… II. ①陈… III. ①古建筑-建筑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TU-092. 44



透镜中的宋代建筑

陈 军 著

责任编辑: 简晓思

责任校对: 邹 东

封面设计: 王亚平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132191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宋代那样纠结:既有“内敛晦守”的政治生态,又有“开放进取”的科技追求;既有“虚中求实”的造物经济实学理想,又有“实中求虚”以“艺术本位”为特征的美学追求;既有重商主义的“百器维新”,又有金石学勃兴的“复古尚古”思潮。这种情况造就了两宋在文学上婉约与豪放、绘画上写实与写意、建筑上奢华与简约等“二元并峙”的局面。

尤其在建筑上,宋代对各种新范式确立的根基,无不始于观察和内省的努力,使宋人在“破”与“立”的关系上进入一个自觉时代。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清晰呈现了影响近代中国的种种新元素。因此,不清楚宋代建筑“转型与定型”的特殊历史节点,我们就无从知晓元、明、清以至民国建筑演化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与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可理解为东方“文艺复兴”先行与等值的发展。没有哪种东西能像建筑那样反映一个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质。建筑史不仅是艺术史与科技史,更是政治史与经济史,因此,本书尝试采用多层历史“透镜”来聚焦一个隐秘王朝远去的背影——以宋代建筑的名义!

前 言

西方关于中国传统建筑“非进化”的定论,长期以来成为困扰中国古代建筑史叙述的重大难题,即便在本土话语体系内解决,亦非轻而易举之事。钱穆先生曾说,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后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我们过去习惯单纯从古代建筑技术史的角度,把中国传统建筑史从其他分类史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那种把遗存、典籍或出土器物按照编年顺序不分轩輊地罗列、依次描述一番的传统架构,显然有着致命的缺陷,尤其是要确切掌握建筑变化背后的复杂因素,阐释建筑究竟为何存在而非如何建造时,就常常显得语焉不详或力不从心。尽管“透镜”在此语境下只是一个修辞,但只有包括古代建筑技术史在内,通过社会历史学的多种组合“透镜”,才能管窥宋代建筑艺术较为完整的轮廓。

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清晰呈现了影响近代中国的种种新元素,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宋代建筑的演化与转型,即如何建构了影响元代、明代以至清代建筑种类与样式的原初模型,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重点。洪再新指出,在艺术史上,宋代确立各种新范式的根基无不始于观察和内省的努力,宋人在“破”与“立”的关系上进入一个自觉时代。宫崎市定也认为,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应该理解为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本书将通过宋代社会“二元结构”的阐释模式,探讨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宋代建筑转型的根源与结果,以及在宋代建筑的变化中,哈耶克强调的试错过程中的“自发秩序”与“制度设计”孰因孰果、孰主孰次,或者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即“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自古至今,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如同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就像如果没有古希腊的文明成就,西方的文艺复兴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工业革命也不会如此顺理成章;同样,如果不了解宋代在整个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节点的



特殊作用,我们就无法弄清楚近代以来,中国建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梁思成曾经一语成谶:中国生活将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的确,目前中国处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型与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呈现出的西化、浅薄与短视倾向,某种程度上源于本土建筑文化的缺失与错位。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史学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提炼、重估与充实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价值”,逐步完成本土建筑“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唯有如此,才能奠定中国建筑走向未来的坚固基石。

陈军

2015年8月于芜湖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普爱伦推崇的“伪经典”与宋学研究	1
1.2 “复兴”还是“复古”? ——建筑背后辉煌与隐秘的世界	5
1.3 “变焦显像”——通过建筑呈现那个时代的轮廓	12
1.4 路径与试错——宋代美术经典性的“坐标”特质	14
第 2 章 “二元结构”之社会情境分析	18
2.1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与“近世说”	18
2.2 “二元结构”模式的表现与成因	28
2.3 文人趣味与百伎空间之二元并峙	47
第 3 章 从人口、城市与艺术趣味上看建筑的变化	56
3.1 从人口数量、密度与迁移看建筑聚落形态的转型	56
3.2 “坊市制”的瓦解引发城市重大转型	71
3.3 两宋建筑涌现出的新种类	86
3.4 崇奢与奉俭:从文人设计看建筑风格的两极递进	103
第 4 章 图谱与绘画——“透镜”中的建筑样式	122
4.1 两宋之前建筑图学的早期源流	123
4.2 图谱观念与建筑图学实践之二元交汇	125
4.3 《营造法式》组合视图的变化比较分析	141
4.4 绘画作为建筑图谱略的再传之功——兼论其隐含的转型“密码”	148
4.5 从《清明上河图》透视学分析看组合视图的意义	159
第 5 章 宋型艺术对周边建筑的影响与遗例分析	170
5.1 宋型艺术对周边建筑的影响	170
5.2 宋型建筑样式的木构遗存变化分析——以宁波保国寺为例	176
第 6 章 古今同构——转型期的困顿与突围	184



附录 A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汴京城所在区域与虹桥位置分析	193
附录 B 郑樵《图谱略》十六类图谱分目列表	194
附录 C 《营造法式》的建筑制图与西方表现的差异与特点	195
附录 D 《营造法式》图样数量分类统计及规范化制图取例	196
附录 E 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建筑平面布局推演分析	197
附录 F 两宋绘画中有关建筑布局推演分析	198
附录 G 两宋建筑相关遗存木构用材数据换算列表	200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12

第1章 绪论

1.1 普爱伦推崇的“伪经典”与宋学研究

关于中国传统建筑“非主流”“非艺术”和“非进化”三个层面的判断,肇始于英国人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著名的“建筑之树”这一命题^①。“非主流”不难理解,毕竟是西方人的视角;至于“非进化”的判断,则的确成为严重困扰中国古代建筑史叙述的重大难题。即便是今天,要在本土话语体系内解决这个问题,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当前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规模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有新的建筑史学的研究成果,来不断丰富与完善本土建筑文化“资本的积累”,因此,实事求是地辨明中国传统建筑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过去、今天和未来本土建筑文化核心价值的建构,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对于两宋艺术方面的成就,国内外学者中浓墨重彩著述者不在少数。譬如,相对流布较广的宋代院体绘画,其细腻、精湛的写实风格就让后人惊叹不已。洪再新先生曾谈到:“1255年出生的宋代皇室成员赵孟頫哪里会想见,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东方部主任普爱伦会对南宋绘画那么推崇备至,甚至对‘伪经典’都肃然起敬。因为在普氏看来,即使是南宋画的赝品,也更胜于后世的文人画真迹。”^②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西方人对两宋艺术如此情有独钟呢?早期受梁启超的影响,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滕固(1901—1941)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东洋大学及德国的柏林大学,曾系统地受到西方美术史学方法的训练。滕固着力于中国画风的“风格分期”研究,他把唐代与宋代列为古代艺术的“昌盛时

^① 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提出著名的“建筑之树”命题,把中国与日本的建筑列为不入流的旁门左枝,通过李允铎《华夏意匠》的转述在国内广为流传。

^② 洪再新:《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载《新美术》,2007年第5期,第12~27页。



代”^①，其力作《唐宋绘画史》突破了沃尔夫林(Heinrich Wofflin, 1864—1945)风格学不涉及风格形成外部因素的樊篱，延伸出对“南北宗论”的批判。^② 1946年，胡蛮(1904—1986)在《中国美术史》的宋代部分也强调了宋代的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因素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学界近来在宋代艺术史的不同视域有不少新的进展，例如，陈传席先生《中国山水画史》中有关“北宋中后期山水画保守、复古和变异概说”，以及对《清明上河图》创作年代与为什么没有入《宣和画谱》所做的细致考证；刘和平先生从宋代《闸口盘车图》的图像功能入手，提炼出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高居翰(James Cahill)对“宋元的禅画”重新阐释及在学界的推介；罗樾(Max Loehr)继滕固之后对宋画“风格分期”问题的再研究；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在继《西方的中国画研究综述》完成之后，又有对宋代美术研究新思路的展现；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在其《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中以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绘画史所做的重新考察；方闻先生在《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中运用“图像学”的方法来疏证“义理”；彭慧萍对南宋画院人事变革、收藏制度研究的新得；范景中先生的《顿悟与致远：老庄、禅与山水画》见解独到、立论深远；曹意强先生在《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中对宋人郑樵^③用图思想的阐释，等等。

① 滕固在1933年发表的《唐宋绘画史》上，把中国古代美术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汉之前为生长时代，魏晋南北朝为混交时代，唐与两宋为昌盛时代，元明清为沉滞时代。

② 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 Combrich, 1909—2001)的“图式理论”都不是单纯地在研究“形式问题”，贡布里希重点阐述的是“程式与匹配”的问题，理论上着眼于多层面、多角度，而且是丰富多彩的，同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一样，绝不局限于艺术的“形式问题”分析。

③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学内人称夹漈先生，兴化县广业里霞溪村人。郑樵的祖父是宋神宗熙宁三年叶祖洽榜进士，其父郑国器，字宗翰，太学生，官至苏州府教训，郑家当属书香翰墨之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里反复称郑樵是“乡下的穷人”极是言之不确，至少其家学渊源是有的，后至家境没落、谢绝人事隐居山野著述，倒是后事。郑樵自幼资性聪颖，求知心强，很小就任在其母的调教下识字读书，并立志“读古人之书”“通百家之学”，常常闭门苦读至夜深方歇，旦至鸡鸣又起，沉吟默诵，畅思潜读，浑然不觉疲累。《宋史·郑樵传》中说“闻人家有书，直逦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如此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郑樵在福建夹漈山盘桓三十余载，埋头治学，对礼乐、文学、音律、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校讎、图谱、目录的学问广泛涉猎，逐一细绎津问。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京城，徽、钦二帝被俘时，郑樵年方二十三岁，作《乐府四怨》以寄哀愤：“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此后，他寻奇访古、饱游沃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撰书当中。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郑樵三十七岁时，写出《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郑樵开始全面着手《通志》，时值佞臣秦桧擅权，郑樵唯恐自己被扣上私人修史之罪名，故寄书方礼部，并呈《上皇帝书》有云“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希望得到朝廷必要的资助，终因身份低微，无以得见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又写出了《校讎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诸书。秦桧病死后，宋高宗不信御史叶义问诬陷郑樵的不实之词，改郑樵任监漳州南岳庙，赐给礼归誊抄所著《通志》，郑樵著书的条件得以改善。



国内对于宋代文史方面的研究,首推台湾宋晞先生所著的《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这本书较为详细地罗列了宋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宋学研究的团体或著作,例如漆侠先生于1982年在河北大学创立的“宋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主持编纂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四川大学出版的《宋代文化研究》,台湾宋史座谈会主编的《宋史研究集》等。至于《全宋诗》《全宋词》以及《全宋文》,业已相继出版;《宋画全集》新近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国外对宋代文化的研究,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如白乐日(Etienne Balazs)发起并主持的“宋史研究计划”,包弼德(Peter K. Bol)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论述,库恩(Dieter Kuhn)主编的《宋代墓葬》,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南宋社会生活史》,等等。再有,郑海峰对古代官员制度研究的宋代部分;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论文《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唐宋庄园制度质疑》;邓之诚对孟元老^①《东京梦华录》的校注;近期,如伊永文的《行走在宋代的都市》,张邦炜的《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吴功正的《宋代美学史》,李华瑞的《宋史论集》,刘方的《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的转型》,周德昌主编的《北宋教育论著选》等,各皆颇有新获。而在两宋时期跨境交流方面的研究有王镛的《中外美术交流史:宋元时期的中外美术交流》,井手诚之辅的《日本的宋元佛画》,台湾黄宽重的《宋丽贸易与文物交流》,韩国张东翼辑的《宋代高丽史资料集录》……这些关于宋史研究的成果,给两宋建筑艺术研究本身亦提供了殷实的理论与史学背景,有的别出蹊径、居功至伟!

“五四运动”是中国学术史的一个分野,不仅是输入的自然科学,包括文学及社会科学,甚至与国学有关的科目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应肇始于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梁思成(1901—1972)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朱启铃(1872—1964)发起并成立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专事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取得过一系列丰硕成果。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之后他主持编写了首部《中国建筑史》。早期有关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还有台湾宋晞的

^① 孟元老,号幽兰居士,北宋汴京人,生卒年待考,对于其身份,学界素有争议,无定论。孟元老曾经在北宋末叶的东京居住二十余年。金灭北宋,孟元老被迫南渡,常忆东京繁华,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撰成《东京梦华录》。



《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中载录的李甲孚的《北宋在开封的宫殿建筑》《南宋在临安的宫殿建筑》，吕佛庭的《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傅熹年的《王希梦〈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的《敦煌莫高窟 53 窟窟前宋代建筑复原》，蔡祚章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中之两经图法》，以及鲍鼎的《唐宋塔之初步分析》等。

文首曾提到，国外建筑学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观，曾把中国与日本的建筑列为无足轻重的旁门别枝。然而，自明清以来，西方一直有另一种声音存在，西方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述，主要集中在 17 世纪前后对中国园林的引介与模仿。如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论东方园林》，昂纳(Hugh Honour)的《中国风》，以及科奈尔(Patrick Conner)的《西方的东方式建筑》等著作^①，探讨陶瓷、建筑及图案方面在欧洲兴起的“中国风”，甚至对西方浪漫主义产生的影响，等等。

1949 年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梁思成、刘敦桢、刘秀峰等人主持编纂了首部《中国建筑史》；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出版。这之后，《汉代的居住建筑》《中国宫殿史》《中国民族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西建筑艺术比较》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等相继问世。高介华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共收集出版了三十四本专著，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还收录了刘克明的《中国建筑图学文化源流》，该书对中国古代建筑图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传统画论与画史亦有相当多的涉及与引述，建树斐然。近来又有郭黛姮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宋代卷》，陈莘的《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以及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的著作《辽代建筑》，张劲的《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等。华南理工大学谭刚毅博士的《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把实物遗存极少的民居作为研究对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其另辟蹊径，通过“缀合式”(conjunctive)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雷德侯、夏铸九、田中淡、普鲁岑、夏南悉、刘叙杰等中外著名学者与会，由杨鸿勋主编的本次会议论文集《营造》，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学最新的成果，学术影响极为深远。

^① 范景中：《笔谈“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Modern：一个带着面具的观念》，载《文艺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31～135 页。



1.2 “复兴”还是“复古”？ ——建筑背后辉煌与隐秘的世界

欣赏中国古代绘画却对其背景文化一无所知，就与“盲人摸象”无异了，因此要想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演化的实情，就必须深入到文化整体中进行考察。本书关于两宋建筑的研究，首先要从内藤湖南(1866—1934)^①的“唐宋变革假说”(hypothesis of Tang-Song transition)或曰“唐宋变革历史论题”(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ang-Song transition)入手。

正是针对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流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各种形式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内藤湖南率先提出了宋代的“近世说”，开始逐步扭转有关古代中国发展停滞的论调，进而就此议题引发了学术界一场世纪论战。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②他的结论是：“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③内藤湖南主要从社会权力的结构、社会阶层的组成与文艺性质的变化等入手，揭示了宋代近世的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假说”的解释模式。

“内藤命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不少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支持与反驳的声音俱甚。作为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1901—1995)把该命题置于东西文化比较视野中论证，进一步拓展了内藤湖南学说的边界。他从内藤湖南忽视的经济视角入手，总结了宋代社会的近世特征：第一，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

①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取义如下：《易·革》九五爻：“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其文炳也。”孔颖达疏：“‘其文炳’者，意取文章炳着也。”他的号作湖南，以其出生地毛马内位于十和田湖之南的缘故。参见砺波护：《内藤湖南》，收于砺波护、藤井让治：《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版，第68页。

② 内藤湖南于1910年，首先在日本的《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开启了一场世纪论战的序幕。他从九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二是君主地位的变迁；三是人民地位的变化；四是官吏录用制度的变化；五是朋党性质的变化；六是土地制度的变化与货币经济；七是学术性质的变化；八是文学的变化；九是艺术的变化。

③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



代,故对产品的“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二,土地制度与人身关系;第三,商业经济,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化;第四,君主独裁,政府和军队的分离;第五,科举与用人制度,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通过科举制向万民开放;^①第六,国民主义的勃兴,宋代的中国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意识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宋代的中国是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而理学则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七,独特印刷术的发达;第八,宋学对于原始儒教思想的复兴;第九,宋代在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②

陈寅恪(1890—1969)先生在其《论韩愈》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家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③他还指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④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强调:“与前朝相比,11世纪到12世纪的宋代,在政治、社会或文化生活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显示出了发生根本变化的迹象。这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而是性质上的改变。如人口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海内外贸易的发展,与还处在半中世纪状态的贵族体系的唐皇朝的情况相比,宋代的政治运作方式、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和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已经诞生,已经具备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特征。”^⑤他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还提到:“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

① 美国学者柯律格(Edward Kracke),据宋代进士登科录所做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官职。他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官僚贵族是依靠官职和考试而获得地位的,官僚贵族的构成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②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载刘俊文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3~242页。

③ 陈寅恪:《论韩愈》,选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陈寅恪:《陈寅恪集》,选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⑤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也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除上述提及的宋代社会整体走向的变化外,关于两宋艺术更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话题。郑振铎先生在五十余年前谈到两宋艺术时曾激赏不已:“宋代(960—1279)的绘画存留于世的比较多。它们向我们展示出中国绘画最优秀的传统。宋代画家所描绘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包罗万象,从大自然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对于都市生活和农家社会的描写,人物的肖像,以及讽刺的哲理作品,犹能杰出于画史,给予千百年后的人以模范和启发。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必当以宋代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画家达到了最好的而且最高的成就,正如辟里克里士时代的希腊雕刻、米开朗基罗时代的欧洲雕刻与绘画一样。在这艺术繁荣、百花似锦的三百二十年里,不止一次地产生了新的作风,那些新的作风,都曾给予后人很大的影响,有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①贡布里希在其《木马沉思录》里亦谈到:“在再现艺术的历史上,古希腊、宋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三个时期,创造了最辉煌的成就。”^②依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里的说法,“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Chinese Renaissance)”。范景中先生亦认为:“即便今人,都难以企及宋人的审美品位。”洪再新先生深入分析指出:“宋学的高明之处,是在‘实’中求‘虚’,揭示宋代美术的经典特质。”^③

然而,正如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因

① 郑振铎:《宋人画册序》,选自《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英]贡布里希:《木马沉思录:艺术理论文集》,徐一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洪再新:《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载《新美术》,2007年第5期,第12~27页。

惑：两宋作为历史上具有超常科技创造力的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巅峰，为何到了近代的后半段却开始落后？究竟是什么使得近代科学终究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本人的解释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些消极因素，比如道家思想；而某些积极因素又被儒家思想及其支配下的封建专制体制所扼杀。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古代中国的模式》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 13 世纪末就开始停滞不前，进入所谓的‘高水平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两宋建筑的话题，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触及不多，业界对于这段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期的确切情形更是知之甚少。

无论唐宋转型的命题存在多少共识或争议，就两宋建筑文化的研究议题而言，若从“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中剥离出来，单纯作为技术史来研究，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不仅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而言，本书通过建筑去了解两宋世界，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个研究的“入口”。

梁思成先生认为，那种把中国古代建筑描述成贯通一体、毫无变化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建筑同语言一样，有其特殊的“文法”与“词汇”，如同罗马式的“五范”（five orders），各有规矩、各司其范。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是什么？中国古代建筑“文法”的建构与变化又是什么？梁思成之前恐无人研究过。梁思成先生指出，古代建筑的“文法课本”首推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再就是清代工部的《工程做法则例》，这两本古籍是打开中国古代建筑之门的“钥匙”。他还通过对两个文本的比较性研究，得出从宋代到清代建筑样式上的重大变化。引而述之，从唐代到宋代建筑样式上的转型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

建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既可能是妙不可言的艺术品，又要满足人类居住的功能性需求与体现符号性排序（权力的象征物）；既有赖于建筑工程技术图学的设计，又要控制成本且坚固耐用。因此，建筑史不仅是艺术史、政治史，更是技术史、经济史。中国以木构为主轴的古代东方建筑同代际明显、风格流变多样且清晰的西方建筑相比，自有其迥然不同的特性。无论怎样，对于 17、18 世纪的西方

① [英]伊懋可：《古代中国的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298 页。



人,那些充满东方情调的中国样式的建筑,曾经如此吸引他们的目光,当时在欧洲兴起的一个专有名词——“中国风”(Chinoiserie),甚至成为西方浪漫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源。^①那个时候,中国园林的样式与布局,就如同当今中国追捧与热衷的“欧陆风”那样,掀起了当时欧洲造园的“中国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热”突然消退。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造园艺术,再也没有退回到原来的古典主义时代,仍然以“自然风致园”为主基调。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园林布局观念上仍维持着影响。^②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楼、亭、宫、阁等飞檐斗拱的外在样式如同其绵延悠长的文化一样,那种超长稳定性让西方人大为惊异。除非专门研究,否则他们根本分辨不出汉代画像砖里的建筑与宋代绘画里描绘的建筑有什么不同,而明清建筑同宋元建筑又有哪些区别。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建筑真的是一成不变、僵化静止的吗?实际上,无论是外力(蛮族入侵、外来文化的传入)的冲击与影响,还是内部的变异与变革(政治、经济变化或技术突破等),建筑史上产生的每一次(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化都显得既难能可贵而又顺理成章。因此,中国建筑艺术史就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如同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后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③

至于近现代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梁思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极有先见地指出:“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他极其无奈地说:“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但他坚持认为,“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这些工程及美术上的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要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以中国现存的几部术书,如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地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

① 昂纳(Hugh Honour)的《中国风》、科奈尔(Patrick Conner)的《西方的东方式建筑》、赫什菲尔德(Christian Cajus Lorenz Hirschfeld)的《造园学》等不少著作,都曾探讨在欧洲兴起的中国风在建筑上造成的影响,甚至牵动了歌德、康德、席勒、伏尔泰、卢梭、坦伯尔、狄德罗等一大批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② 陈志华:《中国的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